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1982

诗 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1982

诗集

邹荻帆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90379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5·北京



1090379

本分集主要编辑人员

主 编 邹荻帆

特约编辑 黄 伊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1982〕

诗 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32.5印张 6插页 643千字

198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355·65 定价: (精)9.55元 (平)6.90元

出 版 说 明

(一)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十多年来，中国的新文艺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深刻地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它是本世纪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对于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编纂一部反映“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优秀成果及其发展历程的拔萃本总集，目的是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进一步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研究、总结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衍变的规律和历史经验，提供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我们也期望这部总集，能帮助广大读者，在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选择精英，统览各个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从中汲取教益；并能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和研究中国的新文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二) 《中国新文艺大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纂的指导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精选、严选、拔萃与代表性相统一的标准，力求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反映我国新文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概貌。

(三) 《中国新文艺大系》按历史时期分辑，由近及远地编纂出版。从“五四”运动前后到一九八二年底，共分五辑：第一辑〔1917——1927〕；第二辑〔1927——1937〕；第三辑〔1937——1949〕；第四辑〔1949——1966〕；第五辑〔1976——1982〕。若干年后，将续编以后的各辑。

《中国新文艺大系》每辑按文学艺术的门类和体裁分集，各辑的分集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所有分集均有主编撰写的导言。入选作品的作者简介汇编于《史料集》。全书索引及必要的资料将另行编辑出版。

(四) 这次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共二十三集。其理论部分包括文艺基础理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文学部分包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散文、杂文、报告文学（包括通讯、特写）、儿童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部分包括戏剧（话剧、戏曲）、电影、电视、曲艺、音乐（声乐、器乐、歌剧）、美术、摄影、舞蹈、书法、杂技；此外，还有一集史料。

优秀的长篇小说本辑不列分集，其目录由《史料集》收选。香港、澳门、台湾作家的作品，因资料不全，难于精确选拔，暂不收录；俟条件具备，另行增补。作品编排一般以首次发表时间或所据版本的时间为序，少数分集分类后再按时间先后排列。注释一律采用原著，凡编者新增加的，均有说明。个别作品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少量的文字改动或由编者订正讹错。

(五) 《中国新文艺大系》的编纂，是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中国新文艺大系总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依靠文艺界的大力支持、组织广泛的社会力量进行的。工作中我们还得到有关部门及海内外专家、读者的热情赞助；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并恳请惠予教正。

中国新文艺大系编辑部

一九八四年九月

導 言

邹荻帆

我想，如果是新诗研究者或是新诗评论家，来编选这本诗选集，可能更合适些。他们可能更广泛地占有材料，可能比较更客观，而且可能从理论的高度来衡量取舍，并且提出有益的经验，促进诗歌繁荣昌盛。而我，一个诗歌习作者，由于长期创作的习惯、兴趣，在遴选时，很难没有主观色彩，而且涉猎不广，因而大海遗珠，被遗漏、被疏忽的珍珠肯定是不不会少的，特别对港、澳、台和在海外的作者，由于掌握的材料很少，只好暂付阙如，待以后再补充、增订。当然，我更难对诗歌发展提出什么有益的经验。应该说，如此众多的诗歌工作者，进行了辛勤的耕耘，开遍了如此众多的、美好的鲜花，肯定有他们的酸甜苦辣的经验。即使在耕耘中歉收的、甚至失败的，也有前车之鉴的教训。可惜，我还力不从心来进行阐释。

粉碎“四人帮”给人们以巨大鼓舞，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英明伟大的政策，拨乱反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更推动了一切工作向新阶段发展。人们是何等精神奋发，迎向朝阳。这些也都鼓舞了当代的诗人。当我看到我们同时代的“五世同堂”^①的老中青诗人都在放声歌唱，而且不是假嗓子唱歌，而是真正从各自的心灵，唱出自己对时代的不同感受，音色不同，音域不同，但组成了真正的时代大合唱。我为诗歌而骄傲、而感奋，我怎么能不怀着我们同时代的诗人们的放声而歌的激情，来记录下他们的歌声呢！

“五世同堂”的五代作家济济一堂，这是丁玲同志对这一时期文艺兴盛的

^① “五世同堂”，指五代文学工作者一起工作。五代是指“五四”时期、三十年代、抗日战争至解放前、建国十七年、粉碎“四人帮”后。

估价。我敢大胆说，诗歌界也是这一形象的最好证明。这里，我特别指前两代的诗人。因为这两代的老作家，有很多都并不执笔从事创作了，而诗人则不同。“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汪静之、谢冰心、冯至、萧三继续发表诗作或诗评，三十年代的老诗人则更是老当益壮，如卞之琳、方敬、王亚平、艾青、田间、光未然、严辰、辛笛、芦荻、苏金伞、徐迟、臧克家等。其中，臧克家除了继续创作诗篇外，并不断叙述自己的创作经验，诲人不倦；艾青则在二十年蛰伏之后，创作了不少惊人的力作，给诗坛留下光彩。至于抗日战争时期以迄于今风起云涌的大量新老诗人，绘成了我们时代的天空的星汉灿烂，我就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了。但是，我相信，诗歌的读者们将铭记着他们的贡献，感谢他们的劳绩。

朱自清先生在编选“五四”时期的诗歌时，把当时的新诗分为三大诗派，即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五四”时期新诗还处于婴儿期。在当时争取科学与民主、反帝反封建的巨潮下，新诗诞生，诗人们做出巨大贡献，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不可企及的高峰，我们也应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但我们决不能厚古而薄今，觉今非而昨是。“五四”时期新诗的现象到底简单得多，新诗创作的队伍还局限于一些新诗开拓者的少数人，它的读者更属寥寥。朱自清先生未就当时新诗的思想内容来分别不同的诗人的立场，各自对当时的巨潮做出了什么努力，而主要只是从诗艺的表现形式上分为三大派。这位新诗的先驱选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做，是做出了他的贡献的。但是，历史终究是客观存在。即使在朱先生分定的大派中，自由诗派的郭沫若与胡适之间，格律诗派的闻一多与徐志摩之间，象征诗派的戴望舒与李金发之间，他们从创作风格到思想内容也都有极大的区别。而当我们对历史进行回顾时，就不能不有所分析，而不能神往于“那时节，各派诗艺互相竞争，各自在自己认定的宗旨中发展创作。在那种自由解放的空气中，各派都出现了有影响的诗人和诗作……”对诗歌艺术只重表现方法而与思想内容截然分开来谈，甚至对立，我以为不是科学的。

我的意思是在说明，如今，特别是在一九七九年后，诗歌创作已形成庞大队伍，我们无法只从诗艺表现形式上来简单分成几大派。譬如也有人把当代新诗分为喇叭诗派、自由体派、民歌诗派、格律体派、朦胧诗派、崛起诗派、边塞诗派、伤痕诗派、小花小草派、旅游诗派等等。这类分法一方面对

新诗持有一些嘲讽之意，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诗歌的形式与内容风起云涌，远不是分为几个诗派就可以说明问题的。

因此，我舍弃了用分诗派的办法来说明粉碎“四人帮”后新诗的成就与问题，而只作一点历史的回顾。这回顾可以说仅凭我的直觉，很难不带有主观片面的色彩，仅供读者参考。

二

谈到一九七六年以后的新诗时，我们不能不回想起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诗歌群众运动。我不同意某些文学研究家的看法，把天安门诗歌群众运动，只当作群众政治运动，而以为诗歌艺术是无可取的。我也不同意另一种说法，认为天安门诗歌主要是民歌体和旧体诗歌，足证新诗还是应该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原地踏步。我认为它给我们宝贵的财富是：优秀的诗篇应该是敢于唱出当代人民的心声，敢于为真理而歌，敢于与丑恶斗争，敢于歌颂时代的英雄人物，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含糊其辞，立场的鲜明是他们最大的真诚。这为当代新诗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诗人应该讲真话、真话应该给人鲜明印象，树立了光辉的旗帜。我们当时吟诵这些诗时泪水奔流，传诵转抄，首先感到的决不是它采取了什么形式，而是它的内容深深打动了我们。当然，在那样悲痛、愤怒、爱爱仇仇交织于心胸，群众迅速以墙报方式张挂于天安门广场时，有不少诗还是即兴而作，因而，简短、上口的民歌和旧体诗形式得到广泛采用，这是可以理解的。

新诗从“五四”到现在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从发展上来看，诗的表现艺术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尽管茫茫九派流中国，但我们仍可以看到主流。每个时代都会有其主流的。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一九七九年后，诗艺呈现出万紫千红的风貌。它有主流，主流是宽广的、美好的，不承认这一点，那是不顾事实，评论就会产生偏差。但也应承认，在百舸争流中，也有三、两只船是打了横，在回流中不前；也有三、两只走错了航线，有触礁之危。应该提出来予以讨论——平等地讨论谈不上谁宽容谁的问题。当然，我们的讨论空气还不够，这是应该努力去促成这种空气更浓一些的。但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评论家，也决不应投某些诗人之所好，而阿谀其缺点与不足。

那么，我想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诗，分为两段时间来说明。第一阶段自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七八年底，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第二阶段自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年底，即党召开十二大前后。这样分为两段时期，是为了阐释问题的方便。

(一) 新诗的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时期

我把粉碎“四人帮”到一九七八年底这段时期，称之为新诗的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时期。粉碎“四人帮”是全党、全民的伟大胜利，我们回想当这特大喜讯传来时，真是万人空巷，走向天安门广场游行，多少人流下激动的眼泪，多少人长街沽酒庆新生。那是真正的人民的盛大节日。随着胜利的到来，党中央为拨乱反正做了许多工作。这时期诗歌界有如下特点：

(1) 当“四人帮”篡党夺权时，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有一条“文艺黑线”进行资产阶级专政。在这样的借口下，把在十七年中活跃的诗人一概视为“黑线”的“爪牙”，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旦摧毁了“四人帮”，这部分诗人如同在寒冬禁锢了很久的春鸟一样，又开始鸣唱。他们异口同声地首先为这一胜利而歌。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有代表性地唱出了人们心潮的起伏，也是有代表性地唱出诗人们的心声。他写着：

在中国，
在十月。
命运大搏斗的
风风雨雨，
我们心潮激荡的
日日夜夜——
怎能不想呵
那长征路上
莽莽昆仑“这多雪”？

在北京，
在十月。

中南海内
波浪起伏，
长安街上
灯火明灭——
怎么不念呵
娄山关前
“而今迈步从头越”？

“这多雪”，是我们前进的路上有这么多的险阻、灾难，特别是“四人帮”造成的灾害。“迈步从头越”，正是我们取得这个胜利后，要继续克服困难，奋勇向前。爽朗的节奏，明快的语言，深湛的思考，读之使人振奋。

同其时不少从噩梦中苏醒过来的老、中诗人，都引吭高歌。光未然的《盛大的节日》、严阵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臧克家的《欢呼，再欢呼》等都在这时出现了。胜利呼唤着诗人，诗人歌颂着党和人民的新胜利，声讨“四人帮”。一时间如阮章竞、严辰、王亚平、方敬、朱子奇、苏金伞、程光锐等都冲破十年封锁，而与读者重新见面。中年诗人如未央、傅仇、高缨、沙白、铁依甫江、金哲、克里木·霍加、饶阶巴桑、雁翼、梁上泉等也都再次出现于诗歌界。

他们是随着胜利的凯歌而来的，因而或者是胜利的欢呼，或者是胜利的微笑，乃至胜利带来的激情的泪水，大都有着胜利的信心。他们的歌声也是拨乱反正政策的体现。没有这个胜利，也不会有他们的歌。

(2) 粉碎“四人帮”后，初期诗歌的另一个主题是痛斥“四人帮”。无疑的，这些诗一般从工农业凋敝、文化倒退、干部受迫害以及“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方面，进行了揭露和声讨，起了一定作用。但应该说，当时一方面这些诗作者长期受到“左”的思想路线的束缚，另一方面还有“两个凡是”的约束，思想还并未得到解放。因而这时期的这类诗歌还显得不够深刻、深沉，这时表现胜利欢乐的情绪要更多一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不少诗，是在祝捷声中，以那些罪行作为烘云托月而写的。由于局限性，正视这一历史的经验还不够。文学艺术是需要有生活中的最典型的细节，才能打动人的心灵的，如果只是一般罗列一些“四人帮”罪行，读者是远远不会

满足的。思想未得解放时，是想不到、或者不敢想到、或者想到而不敢去正视那些细节的。

(3) 刚经历了丙辰清明，又来了胜利后的周总理逝世周年祭，人们在胜利之后，不能不想起这位伟人，这位人民的总理，这位在生前把一切献给人民，而横遭刁难，几乎在“批林批孔”中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圣者。于是在全中国又爆发出了“洒泪祭雄杰”的声音，痛心的哀思，深情的呼喊，悼念我们的好总理。在哀思与呼喊中，不能不与“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及被诬为“反革命事件”中的受迫害的革命家和受害的人民联在一起。

在表达怀念周总理的情意上，这一时期，思想上得到了解放，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也再没有祭悼周总理的禁令。诗歌在这一方面没有了禁区，笑可以放纵，泪可以奔流。动人细节的采取，表达艺术的探索都跨进了一步。大概在这时期不少诗人都从各个角度写了怀念周总理的诗，其中如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李季的《大庆儿女想总理》、公刘的《沉思》等都具有代表性。

我还想提一下黄永玉的《哭泣的墙》和《我认识的少女已经死了》，作为广大人民的哀思与怀念天安门事件受害者的一点证明。在《哭泣的墙》中，作者是写少女们要求进入人民大会堂和周总理告别，而警卫员无法同意，却肃立着跟少女们一起哭泣。作者在最后一节的两句诗中写道：

警卫员们象一堵哭泣的墙，
哭泣的少女扒满墙上。

在《我认识的少女已经死了》中，前四节诗如下：

我认识的少女已经死了，
她不是站在小河对岸的那个少女，
虽然她们都一样的美丽年轻。

我认识的少女已经死了，
为了悼念一位伟大的死者，

她为悼念而牺牲。

我认识的少女是那么纤弱
她曾经怕过老鼠和小虫，
却完成了一个壮丽的献身。

有谁知道她死在何方？
有谁看过那最后的一双
等待黎明的眼睛？

这首诗是纪念为悼念周总理而死于非命的一个少女。作者以缅怀这位死者，烘托出死者对总理的爱戴，以小河对岸的美丽年轻的少女，烘托死者的年轻美丽的形象。她纤弱到怕老鼠、小虫，而她却为悼念伟人而不惜牺牲。人们可曾见到她美丽的眼睛，她那最后一双等待黎明的眼睛！无疑的，这是祖国母亲心上的一道伤痕，让人难忘。

从怀念周总理开始，在初期还有怀念其他革命英烈的，白桦的《群山耸立盼贺龙》也是一篇感人至深的作品。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篇诗，是因为这些与人民喜怒哀乐的情怀紧相联系的诗，给粉碎“四人帮”后的新诗带来新的光芒，新的收获，开始了某些突破。

(4) 这样一些大的胜利、大的事件，可以概称之为人民生活中大的政治事件吧。作为一个当代对人民事业有责任心的诗人，是不可能冷眼旁观的，卷入这样的潮流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时期的一些诗中的欢呼和泪水，大都是由衷之言，较少过去那种假大空的时令调。毕竟这些重大政治事件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诗人既然要抒人民之情，当然有责任为之吟唱。

(5) 这里还不能遗忘了那些过去深入生活，或者当时正在生活基地生活，有着生活素材积累的诗人，也都开始挥戈上阵，唱他们的“生活的歌”。如李季的叙事诗《石油大哥》、戈壁舟的《老牛之歌》、刘章的《北山峦》、李瑛的《在南海》、李小雨的《雁翎歌》，以及杨牧、洪三泰、刘镇、李松涛等的诗。

当然，在这时期由于整个知识界都遭受十年灾难，长期被当作“臭老九”，在十年灾难中，他们或者被隔离，被下放劳改，被歧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诗人也是同样的命运，因而当一旦得到解放时，首先考虑到的是被掠夺了十年乃至二十年的光阴，要争取时间写点作品，填补创作的空白，而不是立即感到要深入生活，去体会各条战线上拨乱反正的新情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情况，以后还延续了一个时期，以至对以后各条战线进一步落实政策中，我们没有创作出反映当前斗争的更坚实有力的作品，不无一些影响。同其时对青年作者也未有计划组织他们深入实际，也造成某些青年诗人闭门冥思。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火热的斗争生活，是时代生活的沸腾点，更是有出息的诗人所应该去深入和理解的。这个真理在任何时候都应坚持。

(6) 这段时间，除了报刊上不断出现阔别十年的老中诗人的名字和诗篇外，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贺敬之的《放声歌唱》、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和《李季诗选》、《郭小川诗选》、《臧克家诗选》、《闻捷诗选》、田间的《给战斗者》等。这些诗集都受到读者的欢迎，对扫除帮腔帮调的诗歌的流毒、诗歌界的拨乱反正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 思想解放、新诗蓬勃发展时期

自一九七九年初至一九八二年底，我称之为思想解放、新诗蓬勃发展时期。打倒了“四人帮”，人们从政治上、组织上得到解放。但是仍然有人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不是当作思想体系，不是把实事求是当做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而是用“两个凡是”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与实践。早在一九七七年五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到了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统一了认识，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随后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的学习在全国开展。这是一场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的思想大革命运动，人们把它比拟为“五四”以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而且在一九七八年，党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还有对各种冤假错案的平反，这样，使一些阔别了二十年的老中诗人重新放射光芒。大量青年诗人也以他们英锐之气，迈进诗坛。

知识分子政策的逐渐落实，“双百”方针的受到重视，都促进了新诗繁荣。这时期诗歌界特点如下：

（1） 诗歌队伍的空前壮大

正如前面所说的，由于思想解放运动和各项政策的落实，调动了诗歌界老中青诗人的力量。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诗歌队伍最壮大的时期。除了前一时期的诗人们仍然继续奋力创作外，连一些久已不写诗，而以小说闻世的丁玲、魏巍、孙犁、路翎都写起新诗来。这里应该特别提出一些有近二十年未与读者见面的诗人群，他们过去受“左”倾错误之害，顶着莫须有的罪名，戴上“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等帽子，而有些诗人是在群众中很有影响的。自一九七八年起，特别是到了一九七九年，我们几乎从各大报刊上，每天都可以从空中发现一些过去隐没的明星，又一一放出了光芒。他们之中，无疑地，艾青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颗，公木、公刘、牛汉、玉泉、吕剑、邵燕祥、罗洛、周良沛、青勃、昌耀、胡昭、流沙河、绿原、彭燕郊、梁南、鲁藜、曾卓、冀汭等都以他们的新作重新与读者见面。报刊上还重新发表了胡风、阿垅等的诗。

从诗艺上说，过去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有些长期受到冷遇的诗人，也重新发表诗作，如蔡其矫、辛笛、陈敬容、杜远燮、郑敏、唐祈、唐湜等。

如果就这时期常出现于大报刊，而且也较为读者所知的诗人来说，总不下一百位。其中如毛锜、文丙、边国政、朱雷、白渔、刘章、刘湛秋、李发模、李小雨、李松涛、李钢、陈显荣、杨牧、林希、张庆明、张学梦、周雨明、周纲、周涛、赵恺、梅绍静、章德益、高伐林、舒婷、傅天琳、雷抒雁、廖公弦、熊召政等，已引起了诗歌界的广泛注意。其中有不少是新涌现的青年诗人。

这时期不但是调动了当代的老中青年诗人的创作热情，而且对“五四”时期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有影响的诗人都作了或多或少的介绍，如对蒋光慈、胡也频、闻一多、王统照、朱自清、徐志摩、戴望舒等，以及出版《九叶集》、《白色花》等诗人合集。同时，也开始了介绍外国的古典诗作和当代诗人的作品。这些介绍和出版，都是应该的，但在评介的分寸感上，却显得有些混乱。一则是给与历史地位的评价不准确，二则是没有掌握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的批判吸收的原则。首先是没有历史地分析那些诗篇在彼时彼地起了什么作用，精神财富应该重视它当时所起的精神作用，它是会有物质力量的。而现在有的论者把思想与艺术孤立起来，片面强调它的艺术技巧、表现方法。而这样做，对此时此地是会产生不良影响的。

（2）诗艺的斗艳争芳

前面提到诗歌的队伍空前壮大，这是一支创作新诗的队伍，他们都各自以自己的姿态步入诗坛，因而，不能不形成各种诗歌艺术的斗艳争芳。诗人们的真正解放，终究取决于是否产生了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新作品，保持他们各自的艺术特色，或者探索新的艺术表现方法。被誉为灵魂的工程师的艺术家是在解放了思想时，才真正解放了生产力的。

我们对当代各种艺术风格，很难象对待历史上的艺术流派那样易于划分，譬如“五四”新文学运动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派”、“现代派”等，都是以一个小社团或某一刊物的社团成员和刊物的基本撰稿者而命名。其实，如严格对这些同一流派的成员进行剖析，他们中的风格有很大不同，茅盾和郑振铎、许地山有很大差异，郭沫若和郁达夫也各有千秋。在旧时代，反动派的统治、出版社的制约、集稿的不易等等，他们不得不以熟朋友、同仁为基本成员而创办刊物，或受出版商之请而办刊物，进而嚶嚶求友。建国后，情况改变了，各种刊物公开征稿，作者可以自由投稿，并有“双百”方针的保证。按照列宁说的，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那么，每个诗人都应是有自己的个性特色，都应独自成家，而不是与旁人相雷同。因此，人为地提倡某种流派，标新立异地自诩为某种流派，相反地要导致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

但这也妨碍我们指出一些当代诗人的艺术特色。

艾青仍然以他的朴素的诗句、真挚的感情写出多方面的感受，在质与量方面都有可喜的收获，显出宽阔的姿态。他的诗歌语言，似乎未经雕琢的，但却是严肃地求得自然和准确。他每一诗段是简明的，显出没有拖沓的进展的层次。虽然他的诗不象他早期的《大堰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那样明显地饱含激情与泪水而歌唱，而仍然以他真诚地感受，以他成熟了的真知灼

见而吟咏。如《在浪尖上》、《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在后一诗中，诗人先从比兴的斗蟋蟀开始（何等可悲，人竟如蟋蟀一样），写了一节，而后是古罗马的环境、斗技的节日各一节，各用了上十行诗表达。而第四节则是两行：

号声一响
死神上场

诗句是“大白话”，而突出了一个新进展层次，令人动容动心。当诗人以大量篇幅辛酸淋漓地描画了一场斗技从开始到结束，使诗人感慨万端，在最后一节诗中，写道：

说起来多少有些荒唐——
在当今世界上
依然有人保留了奴隶主的思想，
他们把全人类都看作奴役的对象，
整个地球是一个最大的斗技场。

诗人在诗中所揭示的，不能不发人深省。当然，这里的艺术感染力远不是简单的一个艺术表达方法问题，不只是艺术风格的解放问题。

老诗人臧克家宣称“多写文章少写诗”，写了不少诗论和总结自己创作经验的文章，但仍然以他一贯严谨的诗艺，写了一些音节响亮、诗句精练的诗篇。

李瑛是自建国以来一直很勤奋、不断以新诗贡献给诗坛的诗人。他以他与部队的特殊密切的关系，广泛地抒写了部队的生活、战士的精神世界。提起反映战士的形象，容易产生一种想法，似乎该是更多给怒目金刚以火焰的性格，于厮杀拼搏中显示他们崇高的感情。这当然是一种艺术形象，但不能简单划一。李瑛却是以他对部队生活的熟稔，细致的笔触，优美的想象，不是用呼号，而是用娓娓动情的吟诵，唱出战士们爱家乡、爱人民、爱党爱国的情怀。他的歌更多的如同一股清泉，沁入人们的胸中。如《甜》，是诗人“在燃烧的战场”上访问而得的诗，写的是战场上炎热的天气，嘴唇干裂，“此时，猛然感到有多么渴，也许，最后一滴血就要烤干！”而战士是怎样想的，诗

人是怎样写的，下面写道：

多想家乡那清凉的井水，
多想祖国那道道清泉，
多想行军路上那江河湖海呵，
此时要端给我，都能喝干！

这些也正是引起战士爱它要保卫它而英勇作战的原因。而下一节诗，更深入揭示了战士的心灵：

倒不是没有一滴水，
摇一摇，水壶里水花激溅；
感谢班长，送我解渴，
深情在我心头掀起巨澜。

为狠狠惩罚凶恶的敌寇，
我要留它浇我那打红的枪管！

这里，一则是班长送水，心头漾起一股“甜”，而更重要的是，战士心头漾起的爱，要用水去浇“打红的枪管”，是他心头涌起的“甜”，送给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的“甜”。

在李瑛的《最后的申请》一诗中，写了一个在 frontline 牺牲的战士：

在火线，找不到一片纸表达心意，
只能写在手心：我申请入党。

这些都是诗人李瑛熟悉部队生活，用他的动人的诗艺创造的诗篇。

另一位在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颇为活跃的诗人张志民，也以他特有的诗艺而受到重视。他早期以民歌与古典诗词为基础的格调，写出翻身农民的诉苦与新时代农民的道德风尚，而蜚声诗坛。一九七六年后，形